

文字学电子教案

黄天树 胡安顺 陈 枫

第三章 战国文字

第一节 战国文字的内容及研究概况

一 战国文字的内容

战国文字是战国时期使用的文字。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上限一般确定在前 475 年(周元王元年)¹，下限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 221 年。研究战国文字主要依靠的是战国时期的材料，除此以外，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字以及秦统一后的文字也是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

战国文字的种类繁多，不象商周文字那样单一。我们可以把甲骨文看作是商代的代表文字，把金文看作是西周、春秋时代的代表文字，但却不好把某一种文字看作是战国时期的代表文字。已出土的战国文字有铜器铭文、石器文字、货币文字、玺印文字、简帛文字、陶文以及盟书等。这些文字的名称有些是从书写材料的角度提出来的，如铜器铭文、石器文字、简帛文字和陶文，有些则是从书写内容和用途的角度提出的，如玺印文字、货币文字和盟书等。

(一) 铜器铭文

战国早期的铜器铭文和春秋时期铜器铭文的内容大体相同。作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 404 年)的 甗编钟，记述作者跟随韩君征秦讨齐，受到韩君的封赏。这种风习至战国中期仍保留在个别器物中。1978 年河北平山县出土的中山王 大鼎、中山胤嗣 圆壶，是白狄别种鲜虞国君 及其嗣子所作，时代在前 309 年或前 308 年之后。二器记述齐王破燕，燕国君臣易位的事件，同时颂赞了老臣相邦 的德行。鼎铭长 469 字，洋洋洒洒，充满了儒家的说教色彩。

从战国中期开始，出现了一种“物勒工名”式的铭文。所谓“物勒工名”，就是在器物上勒刻作器官吏、工匠的名字，以保证器物的质量，如有不合格者，便于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如三十二年邲令戈铭：“卅二年，业(邲) (令) (狄)，石库工 (师)臣，冶山。”邲令是邲(今河北磁县)地之长官，是此戈的监造者，“狄”是其名。“工师”属工官之长，是主持造戈的人。“库”是制造、保管兵器的地方。“冶”即冶铸工匠，是器物的真正制造者，“山”是其名字。

在战国时期的铜铭文中，最发达的是兵器铭文，占的比重很大，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有关。除此以外，战国的铜器铭文还出现在量器和符节上，如“商鞅方升”、“郢大府量”、“新郢虎符”、“鄂君启节”等。

春秋以前，铜器铭文绝大部分是铸在器物上，战国中期以后，往往是在器物制成后用刀刻上去的。

(二) 石器文字

¹或确定在前 481 年(《春秋》终年)、前 468 年(周贞王元年)及前 403 年(三家分晋)。

石器文字包括刻和写在石器上的文字。前者有著名的诅楚文、秦曾孙駟告华大山明神文和秦统一后在泰山、峰山、琅邪台等地的刻石，这些都是研究战国时期秦系文字的重要资料。诅楚文于北宋中叶在秦故地发现，是秦王诅咒楚王的告神文。发现时共 3 石，其刻辞基本相同，只是祭告的神灵不同。秦曾孙駟告华大山明神文近年出土于陕西华阴，有甲乙两块玉简，甲简正面刻铭，背面朱书，乙简两面皆朱书。二简文字略同，共 299 字。简文记载秦曾孙駟有疾，久不得愈，乃祷告于华大山明神，得其保佑，使病体日复。此文对研究秦人礼俗及秦文字的演变情况极为重要，其价值不在诅楚文之下。

(三) 货币文字

战国时期，各国的生产和交换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品市场高度繁荣。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货币的大量发行。在河北易县燕下都(燕国后期的都城)出土了很多刀形币，上边有“明”字(也有人释为𠄎，即燕字)，数量常多达数千枚。在朝鲜渭原(鸭绿江东岸，与吉林集安市邻近)一窑穴中，一次出土曾发现了四、五千枚这种刀币。燕在战国时并不是很发达的国家，尚且如此，他如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魏都大梁，其市场规模均远远超过燕国，当时货币发行数量之大可以想见。

除燕国的明刀币外，齐国有一种“即墨”刀，上有“節(即)墨之大刀”的字样。即墨是齐县名，也是该币的铸造地。此外，赵国有一种直刀，上有“白人刀”三字。“白人”即“柏人”，在河北尧山县西。

另有一种货币叫布，即鍑。鍑原是一种铲形工具，后人模仿其形铸币。布币通行于韩、赵、魏，即所谓的三晋地区，同时也流行于东、西周(战国时分封的两个小国，在今河南洛阳附近)，以及燕、宋等小国。魏有“安邑二釐”布，安邑为魏旧都，“釐”是记重单位。赵有“晋阳”尖足布。韩有“宅阳”方足布，“宅阳”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燕有“纒(襄)坪(平)”布、“右明(司)冶”布等，襄平是燕地名，“司冶”是“右明”属下的铸币机构。

楚国地处南方，货币比较特殊。在楚地发现很多扁平形的黄金小方块，称版金，上面多有钤印“郢铎”。“郢”是楚都，“铎”是称量单位。

楚国还有一种铜贝形的钱，或称“蚁鼻钱”、“鬼脸钱”。此币上有“ ”字，究竟是什么字，说法不一，今人或释为巽，读为钱。

战国晚期，兴起一种体圆、有孔的钱，称为圆钱。这种货币形式，为汉以后各朝所继承。圆钱文字有“西周”、“东周”字样，是东、西周的货币；也有“离石”的字样，即今山西离石县，为赵币。秦圆币有“珠重一两，十三”的文字，“十三”是编号。后来秦兴起了“半两”圆钱，是这种币的发展。

(四) 玺印文字

玺印在秦以前统称玺(字作𠄎)，秦始皇时，规定天子印称玺，私人印只能称章。所以战国印不分公私概称古玺，秦以后除皇帝、皇后外皆称印。

古玺有官玺，即政府机关的玺；有私玺，即个人的私名玺；有成语玺，这主要是一些格言和吉利的话；还有一种肖形印。

官玺的内容多反映的是官员的身份或职能部门的名称。如燕官玺“平阴都司工(空)”是平阴(今山西阳高县)地方的工官印。又如魏官玺“文檯(臺)西疆司寇”是文臺(今山东东明县)的地方司寇之印。又如齐官玺“陈立(莅)事岁安邑毫(或释亭)釜”，是齐国执政者陈视事(即主政)这一年安邑地方的造陶釜者之印。又如楚官玺“太(府)”，太府是为楚王制造器物的机构。

私玺的数量甚多，今所见战国古玺约有 4000 枚。私玺出现的姓氏很多，除王、长、张、肖(赵)、(齐)、奠(郑)、邛(任)、(董)等单姓外，还有淳于、司寇、正孙、尾生、西方、阳城、下池、公乘、苦成、马服等复姓。姓氏多与地名有关，如周、卫、鲁、齐；或与官名有关，如司徒、司马。也有与出身有关的，如公孙、王孙，表示是诸侯或王之后。

成语玺如“敬事”“敬命”“正行”“修身”“忠信”“亡(无)私”等，反映了人们的一种道德修养。而“宜官”“富昌”“千秋”“万金”“福寿”，则表示了人们对功名利禄的愿望。

1995年以来，西安北郊相家巷村出土秦封泥数千枚，其文字不重复者约400枚。这批封泥的时间为战国晚期至秦代。所谓封泥，是古人封缄文书时用印按捺在泥上的遗留，是印的使用形式。秦封泥有“尚浴府印”“寺工之印”“章廐将马”“恒山侯丞”“阳陵禁丞”，很多官名都不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

(五) 简帛文字

在纸发明以前，人们长期以简和帛作为书写材料。简即竹简，另外还有木简，又称牍或觚。所有竹木简上的文字都用墨笔书写，然后用绳子编起来。帛书则是把字写在丝织的帛上。因为简帛容易腐烂，难于保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多是战国以后的材料。

战国简书在历史上曾屡有发现。西汉景帝时，鲁恭王(当时的一个诸侯王)为扩大宫室，拆毁孔子旧宅，在墙壁中获得古文《尚书》、《礼记》等。所谓古文，就是六国文字。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发现战国魏墓，出土《纪年》、《穆天子传》等竹简书，也是用古文写的。

近数十年发现的竹简、帛书以楚国为大宗。其中竹简有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河南信阳长台观、湖北江陵望山、三星观、荆门包山、郭店、随州擂鼓墩等多批。这些竹简中最重要的是包山、郭店的两批简。

包山简有各种文书，是若干独立的事件或案件的记录，属于各地官员向中央政府呈报的文件。从这些文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楚国的政令、司法、职官、民情以及地名等情况。包山简还有很多卜筮祭祷记录，内容都是为墓主贞问吉凶祸福，请求鬼神与先人的赐福和保佑的事情。所请求的鬼神包括各种神祇以及山川、星辰之神等，先祖则有老僮(童)、祝融、(鬻)(熊)、武王等。

郭店楚简包含有多种古籍，主要是道家和儒家的著作。其中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种抄本，绝大部分与今本《老子》相同或相近，但章次不对应，也不分道经与德经。儒家著作包括《缙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是研究战国中晚期儒家学说特别是子思、孟子一派学说的重要资料。

1942年，长沙市子弹库楚墓中出土了一件战国楚帛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该帛书现藏于美国。帛书有很多墨书文字，周边是彩绘的图形，其内容多是有关阴阳数术的，如叙述四时起源、天象的灾异以及十二月的宜忌等。

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1155枚，内容十分丰富。如《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以及《日书》(甲、乙两种)等，其中《编年记》是秦史的大事记，与《竹书纪年》相当。

湖北云梦县龙岗出土的秦简，很多是有关秦代禁苑的内容。其中提到“皇帝”，大约抄于秦代。始皇统一全国后，出巡频繁，其中二十八年到过南郡，三十七年“行至云梦”，此类秦简应为始皇出行时特别颁发的律文。

1979年，四川青川县出土了一件木牍，是秦武王二年(前309)颁布的田律。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了一批战国末年秦国的竹简，其中一篇是《墓主记》，讲述的是墓主丹死而复生的故事，与《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相近。此外还有木质地图和《日书》。地图绘制着 冢山北侧、西汉水上游的山川，并有文字注记。《日书》有甲、乙两种。

(六) 陶文

陶文即陶器上的文字，陶文大多数是器物烧制前用玺印按捺上去的，只有少数是刻上去的。六国陶文以燕、齐两国为大宗。燕陶文如“廿一年八月，右陶尹，佐疾，(?)贺，右陶攻(工)汤”一语，其中“廿一年”据研究是燕王喜二十一年(前234年)，“陶尹”是陶工

之长，“佐”为其助手，“陶工”就是制陶的工匠。齐陶文如“高闾里人陶者曰汨”一语，“高闾里”是齐都临淄的小地名，“陶者”即陶工。

1948年，陕西户县沔河边出土了秦惠文君四年(前334年)的秦封宗邑瓦书，共121字，内容记述分封右庶长宗邑的经过，是秦陶文中不多见的精品。瓦书系刻成，笔画方折险劲，与其它圆转浑厚的陶文形成鲜明对比。

(七)盟书

盟书又称载书，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或卿大夫订立盟誓时写在简策、玉片或石片上的盟辞。订立盟誓时，先在简策、玉片或石片上用毛笔写上盟辞，盟誓完毕后将盟书埋在地下或沉于河中。埋入地下者，其仪式是在地上挖一个方形的坑，这种坑叫坎。然后在坎上杀牲。牲多用牛或猪，大夫也用鸡或犬。杀牲时由盟主割牲耳，取其血盛于玉器。盟主先用口含血，其他与盟者依次含血。接着宣读盟书昭告神灵。宣读完盟书后，将盟书加于牲上一同埋入坎中。盟书一般一式两份，其副本藏于盟府。在河南沁阳和山西侯马先后发现了数批春秋战国之际的盟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六十年代在晋故地侯马出土的近五千多片盟书。这批盟书的出土，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的历史和文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盟书的文辞用毛笔书写，玉片、石片的形状似圭形。盟辞的内容各有不同，篇幅长短不一，最少的仅有十余字，最多的达二百二十余字。其字体变化多样，形态复杂。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整理出版的《侯马盟书》共收盟书用字381个，异体字1274个，是研究春秋战国之际三晋文字的重要资料。

战国文字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由于诸侯割据，自春秋中期以后，各国的文字就有了一定的差异，到了战国时期，这种差异更加明显。不同地域的文字形体各异，这是战国文字的又一特点。战国文字除要区分不同种类外，还要区别不同的地域。本世纪初，王国维根据地域特征把战国文字分为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这种分法一直延续至今。随着资料的不断发现，战国文字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有些学者又进一步将六国文字分为燕、齐、三晋、楚四系，加上秦共为五系。

秦处西周故土，与六国文字比较，秦文字更多地继承了周代文字的特点。战国秦文字有正体，即秦篆，又称小篆；也有俗体草篆，即隶书的萌芽。战国秦文字，特别是小篆，比较规整，符合汉字的发展规律，所以秦灭六国后，以小篆为基础统一文字，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秦朝年祚虽短(前221年~前206年)，但秦文字为汉代所继承，成为正宗。所以战国秦系文字在汉字发展史上，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战国文字的最早发现和出土是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汉代废除了秦的“挟书之律”，广开献书之路。一些未被焚毁的典籍如《孝经》、《左传》、《周礼》、《尚书》、《论语》等从地下、墙壁中被发现，或从民间献出。这些古籍是用战国时期东方诸国的文字写成的，与汉代的隶书迥然不同，这种文字被称为“古文”。一些学者对古文进行了研究。其中贡献最大的学者当首推《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许慎著《说文》“叙篆文，合以古籀”，保留了九千多个小篆，近一千个古文、籀文，并对每个字从形音义三个方面进行了训释，其中有关古籀的形体分析，对我们今天研究战国文字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参见第五章第一节(《说文解字》的产生与编纂目的))。

到了三国时期的魏正始年间，朝廷把《尚书》、《春秋》、《左传》三种经书刻在石碑上，每个字都同时用小篆、古文、隶书三种字体书刻，称作魏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三字石经等。石经中的古文与《说文》中的古文十分接近，应是同一系统的文字，其共同的来源是六国古文。石经古文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据后人研究，出于邯郸淳的后学，邯郸淳是魏初的古文传布者。

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河南汲县盗墓贼掘开战国魏王古墓，从中发现竹简75篇，包括《周易》、《纪年》、《穆天子传》等，皆为古文。到了太康二年(281年)，政府诏令当时

一些著名学者整理这批竹简，荀勖、和峤、卫恒、束皙、续咸等皆参与其事。其中卫恒著成《古文官书》一书，续咸著有《汲冢古文释》一书，遗憾的是这些著作都未留传下来。

隋开皇二年(582年)，长安发现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元年统一度量衡诏书的两个诏权。二十六年诏书中有“丞相状”一语，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据以纠正了《史记·秦本纪》“丞相隗林”一语的错误。

唐代时傅奕根据北齐发现的《古文老子》，对通行本老子《道德经》进行了校订。

北宋初年，郭忠恕根据传抄古文材料，编成《汗简》一书。其后夏竦据郭书增补部分材料，编成《古文四声韵》一书。这两部书对释读战国古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宋中期，在秦故地凤翔、朝那、要册出土了诅楚文三石，苏轼、欧阳修、赵明诚、叶石林等学者都曾对石上的古文进行过研究。

从晚清到民国，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巨增，较为著名的有：战国早期田齐标准器——陈侯四器；1928年—1930年在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魏国标准器——羴钟；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的楚国铜器三十余件；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等。

这一时期对战国文字的研究更加广泛深入。不仅对新出土的器物进行了考释，而且对以前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又重新进行了探讨，如唐兰、刘节、郭沫若、徐中舒、胡先炜等人都先后分别对羴钟及楚国铜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诅楚文自北宋出土以来一直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一时期研究的人比以往更多。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容庚、郭沫若等人都著文对其文字和年代进行了考证。玺印文字、货币文字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对其年代有了更确切的界定。历来把战国玺印归在秦汉玺印中，而把出土的货币看作远古和夏代的遗物。直到清乾嘉时期的才有学者把玺印文字归入“古文”，这一时期的学者则更明确地指出玺文是六国文字，他们关于出土货币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观点纠正了历史上对货币文字认识的谬误。陶文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更有了很大的发展。早期研究陶文的学者以陈介祺和吴大澂等人的贡献最大。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丁佛言的《说文古籀补补》、强运开的《说文古籀三补》均对陶文进行了认真的考释，其后顾廷龙出版了《古陶文录》一书，该书的研究从收字、体例到考释等方面都更为深入和完备。

1942年，在湖南长沙古墓出土了楚帛书，这是罕见的战国帛书材料，蔡季襄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著成《晚周缙书考释》一文。

这一时期对战国文字研究成绩最显著的当推王国维先生。他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的论文中，把“古文”定为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文字。“古文”自汉代出土后，从古文经师起人们一直认为这种文字是远古时代的文字。王国维将《说文》古文与《石经》古文相比较，得出了“兵器、陶器、印玺、货币四种文字为一系，又与昔人所传壁中书为一系”的结论。这一研究成果界定了“古文”的正确年代，为战国文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依据。

战国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和把战国文字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时期是在建国以后。建国以后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除了铜器、货币、玺印、陶文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竹简和盟书。这些资料的出土地也很多，除了战国所有主要国家的故地外，还有一些小国家的故地。建国后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主要有：

安徽寿县鄂君启车节(战国中期楚国)；河南新郑兵器群(战国晚期韩国)；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铜器群(战国中期中山国)；湖北随县曾墓铜器群(战国早期曾国)；山西侯马盟书(春秋战国之际三晋)；河南温县盟书(春秋战国之际三晋)；湖南长沙仰天湖竹简(战国中期楚国)；河南信阳长台关竹简(战国中期楚国)；湖北江陵望山竹简(战国中期楚国)；湖北江陵天星观竹简(战国中期楚国)；湖北随县竹简(战国早期曾国)；湖北荆门包山竹简(战国中期楚国)；荆门郭店楚简(战国中期楚国)；湖北云梦竹简(战国末秦国)；四川青川木牍(战国晚期秦国)；陕西西安北郊封泥(战国末至秦)等。

五十年代末李学勤发表了《战国题铭概述》一文，这是一篇系统研究战国文字的综述性文章。文中按地域把战国文字分为“齐国题铭”、“燕国题铭”、“三晋题铭”、“楚国题铭”和“秦国题铭”五个大类，在介绍这些题铭时特别指出了其地域特征。八十年代末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系统介绍了战国文字的特点，并阐释了战国文字的形体演变规律和释读方法。朱德熙、裘锡圭等人则在战国文字的考释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建国以后在新出土铜器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例如经过郭沫若、李学勤、陈梦家、史树青、孙百朋、唐兰、于省吾、裘锡圭等人长期对蔡侯墓铜器群年代的讨论，现在已基本可以确定为春秋晚期的蔡申侯之器。又如鄂君启车节和舟节的内容涉及到楚文字和楚地理等诸多领域，殷涤非、罗长铭、谭其骧、商承祚、于省吾、黄盛璋、朱德熙等学者对之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现铭文基本上可以读通。另外，张政烺、朱德熙、裘锡圭、李零、于豪亮等学者对中山王墓铜器的考释，裘锡圭、李家浩等学者对曾侯乙墓乐器的铭文和乐理方面的研究以及黄盛璋、林清源等人对战国铜器铭文中的兵器铭文、铭刻款式、文字特点、职官制度、铸造地点的探讨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七十年代以后，不少学者对战国文字进行了分国、断代和综合研究。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率先垂范。其后刘彬徽、李零、黄锡全对楚系铜器，王辉、陈平对秦系铜器，曹锦炎、施谢捷对吴、越铜器分别作了系统的研究。

关于战国货币文字的研究，建国以来取得了新的进展。王毓铨的《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郑家相的《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王献唐的《中国古代货币通考》都涉及到战国的货币文字，裘锡圭、李家浩、李学勤、黄锡全、何琳仪分别对战国货币文字进行了考释。商承祚、王贵忱、谭棣华的《先秦货币文编》、张颌的《古币文编》广泛收集了战国货币文字的资料。

关于战国玺印的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了罗福颐的《古玺印概论》、马国权的《古玺文字概论》、曹锦炎的《古玺通论》，这三部书是有关古玺的综述专著，其中均对战国玺印字作了系统的论述。罗福颐等编纂的《古玺汇编》和《古玺文编》为战国玺印文字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外，石志廉、叶其峰、李学勤、裘锡圭、李家浩、何琳仪、吴振武等学者专文对战国古玺文字作过考释。在秦印的研究方面，王人聪、王辉等人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关于战国陶文的研究，李学勤发表了《山东陶文的发现和著录》一文，这是一篇全面介绍齐系陶文的重要文章。袁仲一的《秦代陶文》、王辉的《秦文字集证》都对秦陶文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郑超的《战国秦汉陶文研究概述》则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百年来的陶文研究概况。另外，金祥恒编纂的《匋文编》、高明等编纂的《古陶文字征》等工具书均对战国陶文及其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反映。

关于战国简书的研究，近年来已形成热潮。史树青、罗福颐、李学勤、饶宗颐、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刘雨、郭若愚等学者对仰天湖、信阳楚简进行了研究。刘彬徽、刘信芳、曾宪通、张光裕、陈伟等人对包山简进行了研究。其中陈伟的《包山楚简初探》是一部全面研究包山简的专著。此外，李学勤、于豪亮、高敏、刘信芳、胡平生等人还分别对云梦秦简和龙岗秦简进行了研究，中华书局已出版了《云梦秦简研究》一书。

关于长沙子弹库的战国楚帛书，建国以后的研究从未停止，其中著名的学者有严一萍、金祥恒、陈邦怀、饶宗颐、曾宪通、李零等。1972年澳大利亚学者巴纳公布了帛书的红外线照片，使许多原先看不清的字得以确认。

战国文字的研究始于二千多年前的西汉，在当时是一门十分发达的学科，然而到了近代，战国文字却成了古文字学科中发展最缓慢的一部分。建国以来，由于出土资料巨增，战国文字的研究又重新崛起，并成为古文字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战国文字种类繁多，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只有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认真总结以往的研究经验，全面整理已发现的各种资料，才能使这一学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节 战国金文选读

战国金文虽已式微，但仍有自己的特色。器类除钟、鼎等礼器外，还有符节、兵器等实用器物，而尤以后者为多。

陈侯因咨敦^①

佳(惟)正六月癸未，墜(陳)^②侯因咨(齊)曰：“皇考孝武桓(桓)公^③，覲(恭)戡(哉)^④！大慕(謀)克成^⑤。其雖(唯)因咨(齊)揚皇考^⑥，嬰(紹)練(鍾)高且黃帝(帝)^⑦，鯀(遷)嗣(嗣)桓(桓)文^⑧，淖(朝)昏(問)者(諸)侯^⑨，合(答)揚厥德^⑩。”者(諸)侯靈(寅)薦吉金^⑪，用作孝武桓(桓)公祭器鐘(敦)^⑫。臺(以)彝(登)臺(以)嘗，保有齊邦。豈(世)萬子孫，永爲典尚(常)^⑬。

【注 释】

①此器著录于《三代吉金文存》9.17.1，8行79字。器主为战国中期田齐威王因齐。齐国初为姜尚封国，后被来自陈国的陈氏家族取代。陈、田古音相同，故陈氏或称田氏，《史

侯因咨敦

记·田敬仲完世家》称田氏。

②金文中妣姓之“陈”写作“陳”，与田齐之“墜”有异。咨：脐字异体，读为齐。陈侯因齐，即齐威王。齐威王在位时，整顿吏治，奖励垦辟，重用贤人，加强了齐国的政治、军事地位。③孝武桓公：指田齐桓公午（不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前374～前357年在位。

④覲：同恭。

⑤慕：通谋。大谋克成：或说指前374年田午弑其君剡及孺子喜自立为公。

⑥扬：显扬。皇：大。考：亡父。

⑦嬰练：即绍鍾，意为继承，嗣续。高祖：远祖。黄帝：轩辕氏，是传说的华夏始祖。黄帝是否为田齐始祖，无考，也可能是齐人的自我攀附。

⑧鯀，从人，米声，与迓通。迓嗣桓文，是说近嗣文考桓公。

⑨昏字作𠄎，乃西周金文𠄎字省写。朝：朝见。问：聘问。朝问诸侯：指诸侯之间聘问往来。

⑩答扬：报答并宣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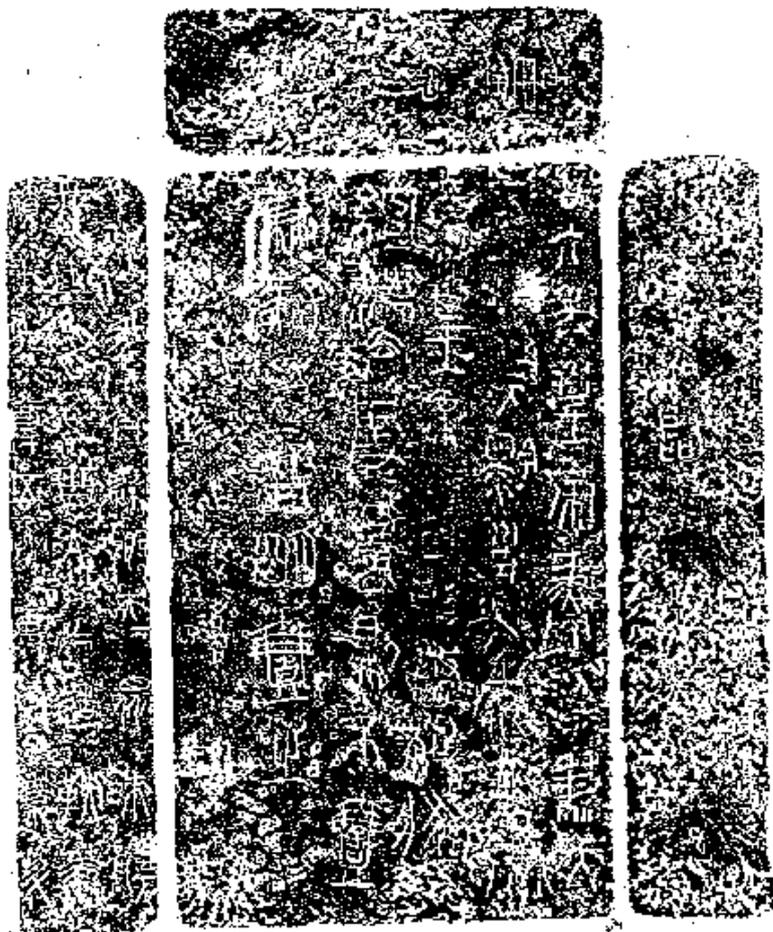
⑪寅：敬。荐：献。

⑫敦：盛食器。此为祭祀用，故称“祭器敦”。

⑬登：文献或作蒸。《尔雅·释天》：“秋祭曰尝，冬祭曰蒸”。这里泛指各种祭祀。

⑭世万：为万世之倒文。典常：法式，榜样。器主告诫田氏子孙，要永远以先人为榜样。

商鞅方升^①



八年^②，齊遣卿夫三衆來聘^③。冬十二月七日，大良造鞅積十六尊分尊(寸)壹爲升^④。

⑤

泉^⑤(前壁銘文)

六年^⑥，皇帝盡并(併)諸侯^⑦，黔首大安^⑧，皇帝。乃詔丞相狀、度量則^⑨，不壹歎疑明壹之^⑩。(器底銘文)

⑪(右壁銘文)

【注 释】

①选自《文物》1972年6期21页。铭文分4处，共76字。器作于秦孝公十八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是秦统一后加刻的。

商鞅方升

②十八年为秦孝公纪年，前344年。

③夫：大夫的合文。众：齐大夫名。聘：聘问。《礼记·曲礼下》：“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

④大良造：本为官名，后转化为爵名。鞅：卫国庶子，又名卫鞅，入秦后得秦孝公信任，实行变法，被封为商君，又称商鞅。尊：读为寸，铭中指立方寸。积：容积。

⑤重泉：秦县，在今陕西蒲城县东南。重泉是方升的第一次置用地。

⑥廿六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

⑦併兼天下：指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诸侯：六国之君。

⑧黔首：黎民百姓。《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裴駘集解引应劭曰：“黔亦黎黑也。”秦人崇尚水德，“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称民曰黔首，大概同这种理论有关。

⑨状：隗状；绾：王绾。二人均为秦始皇时丞相。

⑩法：效法。《荀子·不苟》：“畏法流俗。”杨倞注：“法，效也。”度：长度。《汉书·律历志上》：“审法度。”颜师古注：“度，丈尺也。”量，升斗之类校量

容积的器具。《说文》：“则，等画物也。”即标准器。“法度量则”即供天下效法、参照的度量衡标准器。

⑪歉：通嫌。嫌疑，即有疑问。“不壹嫌疑者”指未经校验不合标准的度量衡器。

⑫壹：统一。

⑬临：地名，或以为是临晋之省。临是方升的第二次置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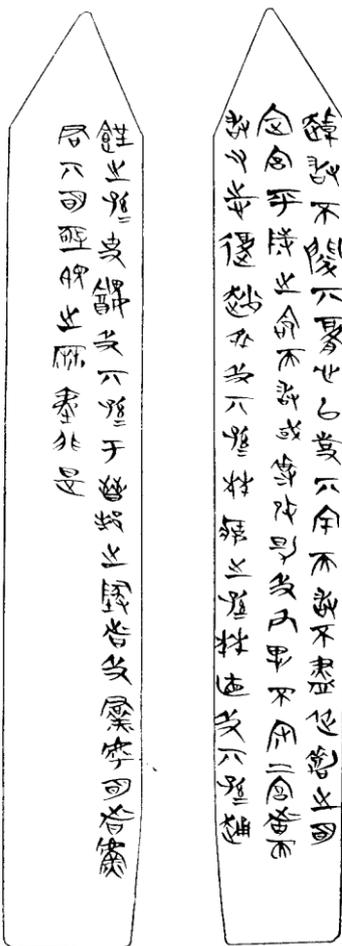
第三节 战国石器文字选读

一、侯马盟书

1965年12月，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载有盟誓誓辞的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这批盟书连同断、残、碎片以及模糊不清或无字迹者在内，共有5000余件。盟誓文辞用毛笔书写、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墨黑色。玉石片的质料有石有玉，形体以圭形为主。盟誓的内容各不相同，篇幅也长短不一。字数最少的仅有十余字，最多的达220余字，一般在三、五十字到百余字之间。其字体变化多样，形态复杂。盟书按内容可分为宗盟、委质、纳室、诅咒、卜筮、其它等6类。关于盟书的年代，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盟书订于前386年，是赵敬侯时的盟书；有人认为盟书订于前424年，主盟人是赵嘉，即赵桓子；也有人认为盟书订于前496年，主盟人是赵鞅。

此处所录盟书摹本取自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所编纂的《侯马盟书》一书。

(一)宗盟类：此类盟辞主要强调要如何重视宗庙祭祀和守护宗庙，反映了主盟人为了加强宗族内部团结进行盟誓以求一致对敌的情况。这里选注的是其中的一份。



趙(chào)敢不闢其腹心^①

闢其腹心^②，以事其宗^③，而敢不盡從嘉之明、定宮平時或或改助及角^④，卑不守二宮者^⑤而敢又志遯趙尼及其孫、執直及其孫、趙鯀之孫、史醜及其孫于晉邦之羣孽明者^⑥，廬君其明亟覘之^⑦，麻臺非是^⑧。

【注释】

①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下同。

②趙：盟誓者之名。敢不：即“不敢不”，表敬副词。闢其腹心：即“剖其腹心”，剖明心迹竭诚相见。闢通判，剖。其：代词。

③事：侍奉。宗：宗主。

④而：如果。嘉：善。明：通盟，盟誓。定宮：宗庙之名。平時：即平時，周邑。命：赐命。主盟人曾在定宫和平時时受到赐命。

⑤或：通惑，惑乱。夔：弁，读为变。 助：

通亶(dǎn), 信, 诚信。 角: 通涣, 离散, 这里指背离盟誓。

⑥卑: 通‘俾’, 使。守: 守护。二宫: 指宗庙里的亲庙(祢)和祖庙(祧)。

⑦又志: 蓄意。又, 通有; 志, 意念。逋: 通复, 返回。赵尼: 与下文列举的“旡旡、旡直、趙鯀、史醜皆为人名, 是敌对派。孙=: 子孙的合文。孙后的“二”是合文符号。旡: 经籍中作“先”, 晋国公族有先氏。晋邦之地: 晋国的土地。墜: 同地。

⑧羣: 聚众。虜: 呼啸。明: 通盟, 这里是私下结盟。

⑨廬: 即吾, 第一人称代词。君: 指主盟人的先世君主。其: 语气词, 表祈使。亟: 通极, 极度。这里是严厉的意思。覘(视): 注视。

⑩麻塋非是: 灭绝其族氏。麻, 通摩, 灭; 塋, 通夷, 灭; 非, 义同彼; 是, 通氏, 族氏。

(二)委质类: 委质类是从敌对阵营里分化出来的一些人所立的誓约, 表示与旧营垒决裂, 献身新的主君。这里选注的是其中的一份。

盥(ān)章自质于君所

盥章自質于君所^①, (所)敢俞
出入于趙尼之所₌及孫^②, 旡旡及
其子乙^③, 及其白父叔父口弟孫^④,
旡直及其孫₌, 旡鑿、旡守之孫₌, 旡
諳、旡癩之孫₌, 中都旡彊之孫^⑤,
旡木之孫₌, 歐及新君弟孫^⑥, 愷及
新君弟孫^⑦, 肖朱其孫^⑧, 趙喬及
其孫₌, 邾諛之孫₌, 邾郟重政之
孫^⑨, 閔舍之孫₌, 趙鯀之孫₌, 史
醜及孫₌, 重癰及孫₌, 邵城及其
孫₌, 司寇其龔之孫₌, 司寇結之
孫₌, 及群虜盟者, 章顛(mò)嘉之身
及孫^⑩, 或逋入之于晋邦之中者^⑪,
則永亟覘之, 麻塋非是。既質之后,
而敢不巫覘祝史^⑫, 毳紕繹之皇君
之所₌^⑬, 則永亟覘之, 麻塋非是。
閔癸之孫₌, 寯之行道弗殺^⑭, 君其覘
之。

【注 释】

①盥章: 盟誓者之名。自质: 把自身抵押出去, 作为质。质, 在盟誓时, 奉献礼物以取得信任叫质, 或写作贄。君所: 指主君所居之处。所字下边的两点是重文符号, 这个符号代表的所字属下一句, 是连词, 如果。

②句首括号内“所”字为本书编者所加, 指前面的重文“所”, 下同。俞: 盟书中或写作谕、綸, 借为偷字。这里指偷偷和赵尼来往。之所=: “=”表示其上字是合文, 即“之所”。下同。

③魋痍：与下文的魋直等人均为赵尼一派。参“**趙敢不闢其腹心**”篇注⑦。
乙：魋痍的儿子。

④白父：即“伯父”。

⑤中都：大概是敌对派的城邑。

⑥趺：魋氏子孙。

⑦陞：魋氏子孙。

⑧肖：通“赵”。

⑨“邯郸”，赵都。

⑩顛：没的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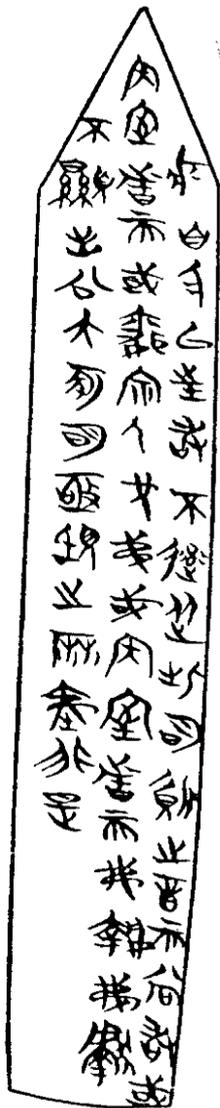
⑪復入：指逃亡国外，又用叛乱、政变等手段返回国内。

⑫巫覡祝史：从事祭祀、祝祷、占卜、文书等职务的官吏。此处用作动词，指从事祭祀祝祷等活动。

⑬獻：荐的繁体字。統：通绥、授，义为进献黍、稷等祭品。绎之皇君之所：再祭于皇君晋公的宗庙。绎，再祭的专名。皇君，指皇君晋公。

⑭寓之行道弗杀：在路上遇到而不杀。寓，通遇。

(三)纳室类：纳室类的内容是盟誓者发誓自己不“纳室”，同时也要反对和声讨宗族兄弟中间的“纳室”行为，否则甘愿接受诛灭的惩罚。



疒自今以往

疒自今以往^①，敢不**逵**从此明质之言^②，而尚敢或内室者^③，而或婚宗人兄弟或内室者^④，而弗执弗献^⑤，不显晋公大冢^⑥，明**亟**覡之，麻壘非是。

【注释】

①疒：盟誓者之名。

②逵从：遵从。逵，率的繁体。明：通盟。质：诚信。

③内室：指扩大奴隶领属权。内：纳的古字。

④婚：通闻。宗人兄弟：同宗的兄弟。

⑤执：捕捉。献：向上级进献。

⑥不显：即丕显。伟大光辉的意思。晋公大冢：晋国先公的太庙，庙也称冢祀。

二、诅楚文

《诅楚文》是秦王诅咒楚王的告神之文。共有三种刻辞，分别刻于三石。据记载三石于北宋时出土，后亡佚。三种刻辞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祭告的神灵有区别。一是祭告大神巫咸；一是祭告大神厥湫；一是祭告大神亚驼。关于《诅楚文》的内容多数学者认为是秦惠文王诅咒楚怀王熊槐；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秦昭襄王诅咒楚顷襄王熊横。据前种说法，《诅楚文》大约刻于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至武王元年(前312—310年)这段时间。这里选注的是其中的湫渊篇。材料取自郭沫若《诅楚文考释》。(暂缺)

第四节 陶文选读

封宗邑瓦书

四年^①，周天子使卿夫(大夫)辰来致文武之胙(胙)^②。冬十壹月辛酉，大良造庶长游出命曰^③：“取杜才(在)酆邱到于漓水^④，以为右庶长歠宗邑^⑤。”乃为瓦书，卑(俾)司御不更顓封之^⑥。曰：“子=孙=，以为宗邑。”顓以四年冬十壹月癸酉封之^⑦。自桑障之封以东，北到桑廙之封^⑧，一里廿辑^⑨。



大田佐敖童曰未^⑩，史曰初，卜蛰，史羈手，司御心^⑪，志是霾(埋)封^⑫。

【注释】

①四年：即秦惠文王四年，前 334 年。

②文武之胙：祭祀文王、武王的胙肉。《史记·秦本纪》：“四年，天子致文武胙。”与瓦书记载同。卿大夫：大夫，辰为大夫之名。

③大良造：秦爵第十六级。

庶长：官名，权力很大。后变为

爵名，又分化为左、右、驷车、大四级。游：即见于秦铜器“四年相邦繆游戈”中的繆游，这里的“四年”为秦惠文王后元四年(前 321 年)，其时繆游已为相邦。

④杜：秦县，故城遗址在今西安市南郊山门口乡。酆邱：即丰京，在陕西长安县沣水西岸。漓水：发源于秦岭，经长安县入渭水。

⑤右庶长：秦爵第十一级。歠：陈直先生以为即《史记·穰侯列传》中的“寿烛”。宗邑：宗庙所在的封邑。

⑥司御：职官，掌车马。不更：秦爵第四级。封之：办理封赐疆土事宜。

⑦辛酉至癸酉共 13 天。

⑧桑障、桑廙：皆地名。或以为是人名。

⑨古以六尺为步，长宽各三百步为里。辑：地积单位，小于里，长宽不详。

秦封宗邑瓦书

⑩大田：农官。佐：助手。敖童：15至18岁未冠之童。

⑪史：职掌文书的小吏，“初”是其名。卜：卜筮者，“蝥”是其名。羈手：史之名。心：司御之名。

⑫志：通识，识记。霾：通埋。埋封，将瓦书埋于封土之下。

二〇〇二年九月